

亚美尼亚政治危机探析

——兼论中国与亚美尼亚“一带一路”合作*

杨 进

【内容提要】 2018年4月发生在亚美尼亚的政治危机导致萨尔基相政权垮台，这是其修改宪法、通过选举操弄权力游戏的直接后果。经过近一年激烈政治博弈，以2019年1月14日帕希尼扬再次被任命为政府总理为标志，亚美尼亚政治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亚美尼亚变局彰显出后苏联空间转型国家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与不确定性。萨尔基相治下的亚美尼亚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腐败、失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不断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引发本次危机。大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激烈争夺与博弈又明显遏制了亚美尼亚外交空间拓展。因而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看，新一届政府都面临着新的极大挑战。“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亚美尼亚合作前景看好，双边合作的互补性优势有望得到释放，但是制约中国与亚美尼亚合作的因素依然存在，有待破解。

【关键词】 亚美尼亚 政治危机 大国博弈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 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8年年初，亚美尼亚国内开始出现一股政治热潮，起因是该国4月即将迎来新一轮选举，产生新一届政府。4月17日，当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根据投票结果公布谢尔日·萨尔基相为政府总理后，这股政治热潮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演变为“天鹅绒革命”。连续多日，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萨尔基相当选。4月22日，反对派领袖尼科尔·帕希尼扬被捕的消息激起了首都埃里温和其他城市新一轮抗议高潮，连强力部门的部分人员也参加到游行示威行列。面对逐渐失控的局面，萨尔基相于23日黯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尽管民众欢呼萨尔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亚国家发展形势及其国际秩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4-3-6。

基相被“赶下台”，但是这只是亚美尼亚政治危机的开端。此后，围绕权力斗争，该国政治精英层展开了数轮博弈，直到2019年1月14日帕希尼扬再次被任命为总理，危机才宣告基本结束。

一 亚美尼亚本轮政治危机的演变及其权力逻辑

萨尔基相是亚美尼亚的老牌政治家，政治经验丰富。他4月23日选择主动辞职，并非没有其他应对手段。在后苏联空间的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曾发生所谓“颜色革命”，政治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选择武力方式控制局面。事实证明，武力手段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还激化了冲突，导致事态加速失控，领导人最终流亡国外几乎成为惯例。萨尔基相主动辞职，缓和了冲突，保留了颜面，也为其后期政治安排留下了操作空间。由于他主动辞职，本次危机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革命”色彩。萨尔基相在当日辞职讲话中勇于承认“我错了”，并呼吁实现“国家和平、和谐”，这是他妥协立场的最佳注解^①。

萨尔基相辞职后，他所领导的亚美尼亚共和党于4月30日宣布放弃提名新总理人选。5月1日，亚美尼亚国民议会再次举行总理选举。反对党联盟提名的帕希尼扬是唯一候选人。不过，这次议会选举，帕希尼扬因为仅获得45票支持，未能达到当选总理所必需的53票而落选。根据选举法，议会7日内进行第二次投票，如果再次失败则议会将被自动解散并依法举行新议会选举。这一局面对处于守势的议会第一大党共和党极为不利，共和党不希望议会被很快解散。5月8日第二次选举，帕希尼扬以59票赞成、42票反对赢得了选举，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这一轮权力博弈，以反对党联盟和帕希尼扬的胜利而告终。

这一阶段政治斗争的主要特征是，以帕希尼扬为领袖的反对党联盟，利用议会选举总理出现的全国性政治热潮，发起对老牌政治家萨尔基相的权力挑战，迫使其辞去总理职务，并在新选举中获得总理职位。分析本轮政治斗争，离不开对萨尔基相执政以来在亚美尼亚政治进程中的政治操作逻辑进行分析。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亚美尼亚发生的“天鹅绒革命”，是萨尔基相用议会选

^① Серж Саргсян ушел с поста премьер – министра Армении. <https://weacom.ru/news/world/politics/186964>

举的权力游戏愚弄民众，从而激怒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结果^①。从政治层面看，选举只是表面因素，选举结果也的确是激起民众抗争的引爆点，但是，从深层次看，真正导致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政治因素具有多维度特点。

独立以来，亚美尼亚的政治转型进程相对保守，历次改革也比较温和。萨尔基相执政十年，期间出现过多次政局不稳局面，但是较少发生重大事件。到本次选举前，萨尔基相已经连任两届总统，按照宪法，他应该退出权力核心了。但是萨尔基相为了继续掌控权力，不惜推动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让亚美尼亚从总统制转变为议会制，通过从实权总统变为实权总理的身份转变延长个人政治生命。

早在 2015 年 12 月，当萨尔基相推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启动议会制之时，就有学者指出，萨尔基相是在为自己当选实权派总理作法律铺垫，他推动修宪的目标并非完善亚美尼亚政治体制。不过，萨尔基相在修宪时曾公开承诺，他不会参加总理选举。因此，2018 年 4 月选举，当他完成总理身份转换时，民众才在被欺骗的愤怒中声讨和反对他。

萨尔基相在位期间没有很好地履行总统对国家和民众的职责，也是民众对他失去信任的重要因素。在他治下，亚美尼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民众生活比较困难。政治精英阶层普遍存在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现象，2018 年“透明国际”披露亚美尼亚腐败感知指数全球排名第 109 位^②。政权执政合法性被贪污腐败逐渐销蚀，萨尔基相的支持率也连年下降。在这次大规模抗议行动中，连军队和警察在关键时刻也加入到了游行示威队伍里。

从政治进程看，亚美尼亚还没有完全完成民主政治转型，政治体制的威权主义色彩浓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萨尔基相 2015 年着手修宪，目标是从总统制转向议会制，这是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变化。萨尔基相公开提出的口号是通过改革革除总统权力过于集中、政党政治发育不良的弊端，使国家权力分配更加平衡，民众参与政治更有保证。无论改革初衷是否如此，也无论萨尔基相是否背弃承诺参选总理，至少在亚美尼亚政治格局层面，他推行的政治改革面临巨大挑战，只要遇到导火索，就会引爆社会走向“革命”。

① Армения: не 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а либеральный реванш. <https://www.translatetheweb.com/?from=en&to=ru&dl=en&a=https%3A%2F%2Feurasia.film%2F2018%2F04%2Farmeniya-ne-narodnaya-revoluciya-a-liberalnyj-revansh%2F>

② Индекс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оррупции – 2018. <https://transparency.org.ru/research/indeks-vospriyatiya-korrupsii/rossiya-v-indekse-vospriyatiya-korrupsii-2018-28-ballo-iz-100-i-138-mesto.html>

第一，独立以来，尽管亚美尼亚政治精英按照新政治规则进行了权力分配，但是苏联时期形成的传统政治思维和执政理念时常体现在实际政治操作中，威权主义特征突出，政党政治发育不足，是亚美尼亚多次发生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新兴民主政体中的政党体系在本质上都是稚嫩、浅薄和多变的”，“候选人可以直接诉诸选民，而全国性选举竞赛关乎个人而非党派和政策差异”，“政党体系不稳定且无法预测，这留给民粹主义广大空间”^①。这意味着，萨尔基相意欲强化的政党政治民主目标恰恰是在其威权主义作派与操作中进行，激起民众不满与抗议完全符合逻辑。

第二，亚美尼亚独立后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还没有为政治运行提供足够包容性，在实际权力操作中，精英视政权为党派和个人谋利的私器，其执政合法性极易受到社会质疑。赢者通吃的政治潜规则，强化了精英对权力的过度追求，侵害了政治正义性。政权当局的任何政策失误，都很容易被反对派利用并向政权发起挑战。2015年6月，亚美尼亚曾因为电价上涨引发全国性抗议浪潮，迫使萨尔基相很快作出了相关政策调整。2018年4月大规模抗议行动也主要是帕希尼扬领导反对党联盟利用选民情绪组织活动。

第三，亚美尼亚政治精英内部还存在所谓埃里温派和纳卡派，地域政治也是导致亚美尼亚权力阶层内斗不止并外溢社会引起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地域政治得以强化，主要基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之争。纳卡出身的领导人在战争特定时期容易得到民众认同和支持。一旦纳卡冲突进入缓和阶段，来自首都埃里温的强大政治力量则很容易对纳卡派发起挑战。时任总统萨尔基相和临时总理卡拉佩强即来自纳卡地区。

2018年5月8日，帕希尼扬出任总理并很快组建新内阁。6月7日，议会通过政府施政纲领，主要目标是惩治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发展经济，增加教育、军队、医疗等领域投入，改善民生和消除极端贫困。尽管议会通过了帕希尼扬的政府施政纲领，但是刚刚过渡到议会体制的实权仍然由议会第一大党共和党把持，帕希尼扬新政府权力受限，共和党利用议会多数优势对政府形成掣肘，帕希尼扬的改革方案几乎得不到议会支持。

为此，执政伊始，帕希尼扬就把打压共和党和提前议会选举列为首要政治目标。新政府通过揭露原高官及其亲信的腐败案，削弱民众对共和党的信任，使共

^① 王菁：《西方民主巩固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和党威信日渐式微。为尽快解散议会达到提前议会选举的目标，帕希尼扬采取了辞职方式。根据宪法，政府总理辞职 7 天内，议会应该提名并通过新总理人选，7 天内没有完成推选工作，应在接下来 7 天内完成第二轮推选，如果第二轮依然没有推出政府总理，则议会自动解散并启动新议会选举程序。

10 月 16 日，帕希尼扬宣布辞职并成为看守政府。他辞职前与议会“察鲁基扬联盟”等党派达成协议，获得他们关于提前议会选举的支持。共和党主张 2019 年春季举行议会选举，认为这样有利于广泛讨论选举法修正案并使各党派做好选举准备。共和党实际打算拖延时间，降低民众对帕希尼扬的支持热情，增加选举胜利的机会。10 月 24 日和 11 月 1 日，经过两次特别会议后，由于议会仍未能选出总理，根据宪法，阿尔缅·萨尔基相总统宣布解散议会。

12 月 9 日，在欧安组织和独联体国家议会大会等国际组织代表的监督下，亚美尼亚举行新议会选举。亚中央选举委员会 10 日宣布，尼科尔·帕希尼扬领导的“我的行动”政党联盟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得票率为 70.43%， “我的行动”政党联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亚美尼亚繁荣党和亚美尼亚光明党分别以 8.27% 和 6.37% 的得票率进入议会。共和党彻底失败，得票率仅为 4.7%，低于进入议会门槛 5% 的规定^①。

根据新宪法，得票超过半数获得多数议席的党派或政党联盟有权提名总理人选并组建内阁。2019 年 1 月 14 日，新一届议会举行会议，“我的行动”联盟提名的米尔左扬被选举为新议长。同日，总统阿尔缅·萨尔基相签署总统令，正式任命帕希尼扬为新政府总理并授权其组建新政府。本轮政治斗争的最大特点是，帕希尼扬领导下的反对党联盟以打击腐败等手段瓦解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再通过总理辞职促成旧议会解散和新议会提前选举，使反对党联盟以绝对优势取得选举胜利，从而在政治上全面掌握亚美尼亚核心权力。新议会选举和帕希尼扬再次当选总理，标志着亚美尼亚政治危机基本结束。

二 经济社会矛盾激化是引起变局的主要因素

亚美尼亚独立后，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尽管亚美尼亚没

^① Досрочны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Армении (2018). [https://ru-wiki.ru/wiki/Досрочные_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_выборы_в_Армении_\(2018\)](https://ru-wiki.ru/wiki/Досрочные_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_выборы_в_Армении_(2018))

有采取激进“休克疗法”，但是在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中，所有转型国家初期遇到的问题在该国都全部出现，有的更加突出。亚美尼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发育成熟度相对较低。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只是苏联时期旧精英们对新国家资产进行的巧取豪夺，他们成了新亚美尼亚各个领域的经济“寡头”。寡头们和政权当局关系密切，掌控着国家资源，经济领域的腐败相当严重^①。

寡头在后苏联空间国家司空见惯，过去一般认为寡头主要存在于经济发达的大国。实际上，对于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人口相对不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亚美尼亚这样的国家而言，寡头经济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存在寡头。例如，反对派政党“繁荣亚美尼亚”领导人加吉克·察卢基扬就是著名寡头，他是“繁荣亚美尼亚”集团的老板，生意涉及建筑、药品、乳制品、啤酒、食品、体育赛事和出口贸易等等。察卢基扬是亚美尼亚首富，在政治领域也具有巨大影响力，是该国呼风唤雨的重要人物之一。

寡头经济往往与不正当竞争有关，而且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罗斯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亚美尼亚富人排行榜前 10 名有 5 位寡头拥有自己公开的企业、集团和俱乐部，还有数位是前任和现任高级官员，他们有的没有公开显示自己的经营实体，但是财富惊人。其中前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在财富排行榜中名列第八^②。

经济寡头化以及较为突出的腐败引起市场环境恶化，加之亚美尼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固定资产投资率低，投资积累缓慢，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原本脆弱的亚美尼亚经济更是受到直接冲击，GDP 进入长期低迷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亚美尼亚代表乌斯丘科娃认为，亚美尼亚创业率低于多数地区，邻国格鲁吉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指数高于亚美尼亚几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刺激国内投资对于提高和维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美尼亚投资水平明显下降”。她认为，“在亚企业面临着一系列对其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如

^① Уровень коррупции в Армении вызывает у Пашиняна шок. <https://ria.ru/20180720/1525045444.html>

^② Самые богатые люди Армении. <http://ideas-of-business.ru/samyie-bogatye-lyudi-armenii/index.html>

营商法规、官僚主义、税收和腐败等”^①。

经济增长停滞，新增企业数量不足，企业开工率下滑，新增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就业需求，失业问题凸显。截至 2019 年 2 月 5 日，亚美尼亚预测失业率为 15.7%，实际失业率为 15.3%^②。萨尔基相执政时期，亚美尼亚年轻劳动力大量远走俄罗斯和欧美国家，“劳动移民”潮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研究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亚美尼亚人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很多人都是独立后离开亚美尼亚到境外寻求工作。近年来，亚美尼亚境内人口维持在 300 万内，增长极为缓慢，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年轻人出境寻找工作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

贫困问题也困扰着亚美尼亚社会，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退休金领取者、失业者、妇女、儿童、丧失劳动力的人群很容易沦为贫困人口。亚美尼亚国家统计局 2018 年数据表明，该国当年约有 70 万贫困人口，全国贫困率达 25.7%，这意味着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有些州贫困率高达 44.3%^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参加 2018 年 4 月抗议示威的民众，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其中又以大学生、年轻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为主。

萨尔基相执政时期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力度没有满足民众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基本要求，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在国家面临重大政治改革时特别容易找到不满情绪的宣泄口从而形成“革命”形势。因此，无论萨尔基相如何宣称议会制改革多么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并能够推动经济改革向纵深和成熟方向发展，但是在现实民生问题面前，民众选择了反对他再次执掌权力，尽管民众也不一定支持反对派。这是后苏联国家“颜色革命”频发的基本逻辑。

三 大国博弈是助推亚美尼亚变局的外部因素

亚美尼亚地处南高加索地区，历史上长期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往来之地，大国博弈十分激烈，历史上多次沦为大国争夺的牺牲品。亚美尼亚曾经数次被周边大国占领、瓜分，甚至发生过被异族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残酷“屠杀”。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亚美尼亚又因为纳卡地区归属与阿塞拜疆发生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美尼亚创业率低于多数地区》，<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2/20181202819457.shtml>

② Армения – Уровень безработицы. <https://ru.tradingeconomics.com/armenia/unemployment-rate>

③ Бедность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анорама Армении. <https://www.armstat.am/ru/?nid=81&id=2095>

了剧烈冲突直至战争。尽管亚美尼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占领了纳卡，但是争端引起的长期安全威胁至今制约着该国政治、经济乃至外交战略安排，形成了亚美尼亚内政外交困境。

在亚美尼亚周边，至少有两个敌对关系国家：一个是有领土争端的阿塞拜疆，一个是有历史问题争议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零星战斗至今仍未停止。与土耳其则因为“种族灭绝”历史问题争议至今没有建交。基于安全考量，独立后的亚美尼亚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逐步与俄罗斯结成了准政治军事联盟关系。亚美尼亚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的参与者。早在1995年，两国就签署了关于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境内建立102号军事基地的协议，2010年两国又签署条约，把该基地的有效期延长到2044年^①。阿塞拜疆学者认为，亚美尼亚能够长期占领纳卡，主要是依靠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和帮助^②。亚美尼亚作为小国，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与大国结成联盟是现实主义选择，但同时也制约了其拓展外交空间的灵活性。

2014年10月，亚美尼亚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加入了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先期签署的《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成为了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相比此前，亚美尼亚只是与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存在密切关系，而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亚美尼亚开启了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在经济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性达到了新高度。事实上，俄罗斯一直是亚美尼亚的主要境外投资者，俄罗斯企业在亚美尼亚能源、交通、电信和冶金等领域占主导地位。2015年6月亚美尼亚爆发的全国性抗议，导火索就是俄罗斯在亚美尼亚的电力公司提高电价引起民众不满^③。

2018年4月政治危机，帕希尼扬在发动民众参加“天鹅绒革命”时喊出了一些反俄口号，比如断绝与俄罗斯关系，退出欧亚经济联盟，撤销俄罗斯的驻亚军事基地等，引起了俄罗斯高层的不安和不满。不过，在萨尔基相宣布辞职后，为了获得俄罗斯的关键支持，帕希尼扬一改此前论调，声称对俄关系依然是其上

① Кто выдавливает российскую военную базу из Армении? <https://masterok.livejournal.com/4714173.html>

②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ученый рассказал в Киеве о карабах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https://aze.az/news_azerbaydzanskiy_ucheny_117516.html

③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нергетики в Армении повышают тариф и вызывают протест. https://www.dp.ru/a/2015/06/23/Rossijskie_jenergetiki_v_A/

台后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亚美尼亚将承担对俄全部义务^①。由此可见，无论在政治、安全还是外交领域，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影响力全面而深刻，无论谁执政，亚美尼亚短时期内很难弱化俄罗斯的影响。

亚美尼亚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其古老的宗教文化对欧美国家有天然亲和力，历史上因为“种族灭绝”大量流落欧美国家的亚美尼亚裔则扮演着文化纽带的角色。独立后，亚美尼亚社会加入欧盟的意识十分强烈。同时，亚美尼亚地处欧亚连接处的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也使其成为欧美国家争相合作的对象。近年来，欧美西方大国有意加强与亚美尼亚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领域的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亚美尼亚参加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还派兵参加了美国在阿富汗等地的国际反恐行动，近期又批准了与欧盟的《全面扩大合作伙伴协议》。

尽管如此，因为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亚美尼亚与欧美大国的合作始终难以取得新突破，合作领域和合作深度受到一定限制。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逐步升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作为俄罗斯紧密伙伴的亚美尼亚的国际合作也受到了明显影响。在欧美国家看来，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在政治军事领域形成的联盟关系，阻碍了亚美尼亚与西方国家的合作进程，亚俄关系也是欧美公司投资亚美尼亚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4 月政治危机期间，欧美大国对亚美尼亚各方政治力量的立场较为温和，没有直接干预危机进程，表现出西方大国对亚美尼亚有着特殊的政策考量。

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以及土耳其的尖锐矛盾延续多年，使亚美尼亚一直处于被这两个地区大国封锁的状态。在能源、交通、贸易等领域大大增加了亚美尼亚参与国际合作的成本。近年来，阿塞拜疆有意加强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合作，积极开展类似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南部天然气走廊”和“跨安纳托尼亚天然气管道”等大型跨国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绕开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的外交困境在于，特殊的地缘位置、领土争端和历史包袱使其很难像其他小国那样可以利用大国博弈的有利因素实施平衡外交战略。一方面，民众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更加认同欧美生活方式，向往加入欧盟，强化与西方合作；另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和安全考量，又不得不在外交上与俄罗斯形成紧密盟友关

^① Армения – Россия: Пашинян меняет приоритеты? <https://planet-today.ru/geopolitika/item/87026-armeniya-rossiya-pashinyan-menyaet-prioritety>

系，从而在战略上难以实现与欧美关系进一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格局将牺牲亚美尼亚的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4月抗议活动期间，反对派领袖喊出反俄口号能够引起部分年轻人认同，是对这一复杂格局和亚美尼亚民众心态的很好诠释。

四 中国与亚美尼亚“一带一路”合作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亚美尼亚所处的南高加索地区地处欧亚大陆多个地缘板块的结合处，是国际资金、信息、商品和人员交流的重要通道。亚美尼亚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则为其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人文基础。亚美尼亚政治危机被限定在有限范围，并在一年内顺利解决，为亚美尼亚继续参与国际合作，尤其是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创造了基本条件。

中国是最早承认亚美尼亚独立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1992年4月6日），亚美尼亚一直将对华关系置于“外交优先发展方向”。2004年9月亚美尼亚总统科恰良访华时指出，“两国在政治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经济合作发展顺利，在国际问题上立场相近”，强调“双方将加强在能源、化工、农业科技各领域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表示，中国将“与亚方共同努力，推动中亚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迄今两国已签订了包括《两国政府联系公报》《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中央银行合作协议》、《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等数十项涉及双边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文件。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亚美尼亚官方积极响应、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2015年，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双方将积极落实已签署的相关协议，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①。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实现走出去，对亚美尼亚进行投资合作并取得了良好的前期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黑龙江火电第一工程公司中标的亚美尼亚110KV变电站改造项目，在激烈竞争中取得了项目总承包权，项目金额达4000万美元；黑龙江火电第三工程公司与亚俄天然气工业公司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全文），<http://am.chineseembassy.org/chn/ztlm/srjxztfh2015/t1254251.htm>

总额达 8 639 万美元的亚美尼亚拉兹丹电厂 5 号机组改造项目,标志中国企业在亚能源市场取得重大成果;华为公司击败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等对手,成为亚 3G 无线设备的独家供应商;中兴通讯与亚电信公司签署为期五年的无线本地环路 CDMA 网络框架合同,实现覆盖 75% 的亚美尼亚国土面积,100% 的亚美尼亚农村得到电话网络覆盖;中国水电建设集团、西安西电国际工程公司和方恩医药等中国公司在当地都有很好的投资合作项目。

2018 年,中国与亚美尼亚经贸额达 7.7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9.3%。尽管从单纯贸易额看体量不大,但是发展势头良好,经贸合作质量也相对较高^①。从 2014 年起,无论从进口还是出口角度看,中国均稳居亚美尼亚经贸合作伙伴前三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与亚美尼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展开合作具有很大想象空间。基于本文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对外经贸关系、中亚合作的领域以及亚美尼亚在国际分工中所处位置进行分析后,可以认为,中国与亚美尼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将为两国带来以下新机遇:

第一,利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亚美尼亚将获取中国优惠贷款或投资,大力改善本国单一经济结构状态,为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并倡议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实现优势产业国际转移,充足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储备,为两国打开了产能合作的广阔前景。

第二,利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助力亚美尼亚发展交通、能源、农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尤其推进亚美尼亚最为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亚美尼亚的国际投资环境。亚美尼亚长期被阿塞拜疆、土耳其封锁,国际联通能力差,建设新的联通国际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亚美尼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第三,利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通过大力发展与中国经贸合作关系,亚美尼亚可以改善国际分工状况,提升经济独立水平。亚美尼亚经济高度依赖俄罗斯,在产业国际分工上处于下游地位,产业空心化不利于亚美尼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利于实现国家经济独立。亚美尼亚重视与俄罗斯、欧盟及中国关系,在这几方关系中,通过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可以促进亚美尼亚在更广阔空间进入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产业国际分工升级。

^① 《2018 年亚美尼亚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外贸额增长 11.3%》, <http://a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2/20190202837385.shtml>

第四，在“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在实现深度对接的背景下，利用“一带一盟”合作带来的机遇，提升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位，使亚美尼亚有可能扮演多个国际合作机制的关键节点角色。

第五，对中国而言，与经济体量并不大的亚美尼亚开展“一带一路”合作，主要利益在于亚美尼亚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可以通过合作，以较小投入形成示范效应，带动“一带一路”合作向纵深发展，践行中国外交新理念。

尽管中国与亚美尼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能够为两国带来上述利益，是推动两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原动力，但是必须同时看到，两国合作还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面临的所有风险在亚美尼亚均存在，而有些风险则是亚美尼亚所独有的，对此必须有清醒认知。

第一，亚美尼亚政治转型进程并未最终完成，各派政治力量关系错综复杂，政局稳定性相对脆弱，特别是容易受大国和地区强国博弈冲击，政局和外交走向存在被大国左右和操纵的可能性，这将为中国企业投资安全带来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二，亚美尼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成员，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俄罗斯，与俄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在机制上给中国与亚美尼亚合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障碍和市场壁垒，提高了双边合作成本，消除这些阻碍性因素，需要理顺各种复杂关系。

第三，亚美尼亚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国际投资合作的制度性障碍不少，中国企业进入该国投资合作还面临腐败和法律对接等棘手问题，依赖“人脉资源”解决投资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增加了企业投资成本与经营风险。

第四，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纳卡冲突暂时看不到任何解决前景，与土耳其的历史纠葛也难以化解，长期受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经济封锁，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周边市场，也增加了企业交通运输成本。

第五，亚美尼亚经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明显，特别是与俄罗斯经济几乎形成联动效应，加之外汇储备量小、汇率不稳定，这些状态短期难以解决，将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投资收益和效率。

结 论

亚美尼亚政治危机的爆发是后苏联转型国家在探索国家发展模式道路上的一

次再调适，萨尔基相推动总统制到议会制的体制性变革并非危机的根本因素。政治家放弃对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的承诺，剥夺民众选择权从而激起社会愤怒，是这次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后苏联转型国家的威权主义政治从长历史看，都将面临再民主化进程的多次洗礼才能臻于成熟。

亚美尼亚的市场转型是伴随着主权国家独立进程同步进行的，转型初期的无序私有化为经济寡头化提供了便利条件，寡头经济又进一步限制了亚美尼亚投资积累和经济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空间。重要的是，寡头与权力往往存在共生关系，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失业、贫困普遍困扰普通民众生活，大量移民外迁带走优质劳动力，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在政治选举敏感期，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容易成为引爆政治事件的导火索，亚美尼亚政治危机正是多年经济社会矛盾积累的总爆发。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土耳其的矛盾涉及彼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因而在短时间内看不到解决前景，基于国家安全保障需要，亚美尼亚将继续维持和深化与俄罗斯在多个领域的高度一体化，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尽管亚美尼亚发展与欧美关系有着很好的文化认同与院外集团（欧美的亚裔移民）条件，但是与俄罗斯的紧密一体化关系限制了亚美尼亚外交空间的拓展。对于亚美尼亚政治危机，俄罗斯与欧美的立场也是事态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俄罗斯不反对帕希尼扬新政府上台，欧美不干预亚美尼亚“革命”，是本次政治危机能够在亚美尼亚精英内部化解的重要外部条件。

亚美尼亚对华友好，与中国外交关系基础牢固，是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这是中国与亚美尼亚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为亚美尼亚带来了改善投资条件、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国际分工等诸多机遇。尽管中国与亚美尼亚在投资合作领域存在政治稳定风险、机制障碍风险、投资效益风险等等，但是两国合作潜力大，合作领域多，合作需求强烈，中国企业只要认真选取那些有投资价值、亚方欢迎的领域进行合作，就能化解风险，收获较高投资效益。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亚美尼亚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技、金融、农业、经贸等诸多领域合作的前景已经开始展现，双边在各领域合作的互补性优势也有望得到充分释放。

（责任编辑 陆齐华）